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八期
2012 年 9 月　　頁 71~120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建構

王　文　進*

提　要

東晉史家習鑿齒的史著《漢晉春秋》、《襄陽記》兩本著作雖然合計於裴松之《三國志注》徵引的數目中僅排名第八。在一百五十七種史籍中遠不及曹魏・魚豢《魏略》、《典略》與王沈《魏書》、孫吳・韋昭《吳書》等著作。但由於習鑿齒在唐代史家所撰《晉書》中備受推崇，其人格也燦耀千古，不像王沈的行徑頻遭非議，也不像魚豢人微言輕、名不列經傳，更不像韋昭在傳統三國史中向來置身在曹魏、蜀漢爭霸的舞臺漩渦之外。故習氏之作的重要性不應以量次計，尤以其在一片擁曹抑劉的潮流中，獨標仁義王道之師，力舉蜀漢大纛，對爾後南宋・朱熹《通鑑綱目》以蜀漢爲正統的史觀遙啓其端，進而對說部《三國志演義》的敘述角度及諸多重要情節產生極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是以本文即擬就習氏如何透過對諸葛亮神話的建構逐步架築其蜀漢正統論的歷史體系，進行描述與解析，並試圖據此標示習氏在三國史研究中的關鍵地位。

關鍵詞：裴松之《三國志注》、《漢晉春秋》、鄉里情結、臥龍、三國正統觀

本文於 101.04.26 收稿，101.09.07 審查通過。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Xi Zao-C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yth of Zhuge Liang

Wang Wen-Chin*

Abstract

Among the 157 historical works cited in Pei Song-Zhi's commentary on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Eastern Jin historian Xi Zao-Chi's two historical work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Sages in Xiangyang* only rank as the eighth most frequently cited works. This rank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Yu Huan's *Brief Account of the Wei Dynasty* and *Brief Account of the History Records*, Wang Chen's *Book of Wei*, and Wei Zhao's *Book of Wu*. Nonetheless, the cited frequency does not represent the importance of Xi's works, because Xi is heavily praised in the *Book of Jin* and long remembered as a person with a dignified personality. H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an Chen, who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his behaviors; Yu Huan, whose personality and words are scarcely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and Wei Zhao, who has always been outside of the struggles between Cao Wei and Shu Han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prevailing tendency to praise Cao and repress Liu, Xi strongly praises Shu Han and stands for virtue and benevolence in his works. His idea becomes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cursor of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regards Shu Han as the legitimate reg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hich greatly influences Zhu Xi's *Outlines of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of Aid in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angle and key plot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the above concerns, the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how Xi develops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that maintains the legitimacy of Shu Han by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Zhuge Liang, and thus proclaims Xi's importance in the studi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Keywords*: Pei Song-Zhi's commentary on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anjinchunqiu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homeland complex, Wolong, legitimacy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建構*

王　文　進

一、引　言

劉宋時期裴松之（370-449）[1]在奉詔編纂之《三國志注》（後文簡稱《裴注》）中間接保存許多珍貴的史料。在裴氏引用的兩百二十五種書目中，史部典籍就高居一百五十七種之多。雖然因而遭到唐代史家劉知幾（661-721）譏之爲坐長蕪亂，[2]但無論就裴松之的自注，或者是其徵引的史籍以及諸多議論，[3]皆有助於後人據此分別出各國對峙下的「敵國傳聞」，或者是緬懷家邦

* 本文爲國科會多年期研究計畫：〈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南方史籍史觀之研究 100-2410-H-259-050-MY3〉的成果之一。原題名爲〈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締造〉，2012 年 3 月 17 日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經學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同時承蒙討論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張蓓蓓教授講評。並對兩位評審委員提供之寶貴意見，致上萬分謝意。

1 詳見陳健梅：〈裴松之生卒年考〉，《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1 年 5 月），頁 52。

2 《史通・內篇・補注》：「（裴）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23。

3 深加讚美者亦有之，如清・李慈銘（1829-1894）：「裴松之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爲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 月），上冊，頁 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專美之辭」，呈現出見聞各異、爭勝抑揚的三國爭霸史。[4]

就單位史家的徵引次數而論，習鑿齒（？-384？）[5]在《裴注》徵引書目之中，《漢晉春秋》與《襄陽記》分別爲 67 及 15 條，共計 82 條之多位列第八：僅次於曹魏・魚豢《魏略》與《典略》之 219 條，[6]王沈《魏書》190 條，西晉・虞溥《江表傳》123 條，孫吳・韋昭（204-273）《吳書》115 條，西晉・張勃《吳錄》109 條，東晉・孫盛（307-378） 95 條，[7]西晉・郭頒《世語》84 條。[8]雖然習氏二書合計次數遠不及魚豢《魏略》《典略》、王沈《魏書》、韋昭《吳書》等諸家，但絲毫不減其在三國史中的重要地位。習鑿齒在唐代史家所撰《晉書》中備受推崇，[9]其人格也燦耀千古，不像王沈的行

4 李純蛟：「當時一些史家，如《魏書》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魚豢、《吳書》作者韋昭等，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因而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見氏著：〈《三國志》的史學〉，《《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9 月），頁 66-67。

5 吳直雄考定卒年在西元 412 年，見氏著：〈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74-80。葉植則對吳氏一系列相關成果進行批判，見氏著：〈論題係沙上建塔，鐵證乃謬誤堆成——答吳直雄先生並與其《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再考辨》一文商榷〉，《襄樊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3-23。不影響本文的情況下，先暫用傳統按《晉書》、《建康實錄》記載所判定，習鑿齒於淝水之戰（383）後的太元九年（384）左右卒。

6 《魏略》一書雖晚至晉初脫稿，但主要是在曹魏時期所撰寫的。詳見羅秉英：〈《魏略》的上限和下限——兼說《魏略》成書年代〉，《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頁 19-28。

7 孫盛著作甚多，裴松之主要徵引《魏氏春秋》55 條、《晉陽秋》20 條。

8 關於《裴注》引書之數據，係參閱余志挺、林盈翔之成果與自行統計。見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 3 月，原臺師大國文所碩論，林礽乾先生指導，2003 年），頁 93-119；見林盈翔：《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文進先生指導，2010 年），頁 135-142。

9 唐初史臣於《晉書》卷八十二將習鑿齒與兩晉其他著名史家，包括西晉陳壽（233-297）、王長文（238-300）、虞溥、司馬彪（243-306），與東晉王隱（284?-354？）、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徐廣（352-425）置於同卷。且不惜全文

臺灣華藝學術期刊資料庫

徑屢遭非議，[10] 不像魚豢人微言輕、名不列經傳，[11] 更不像韋昭在傳統三國史中向來置身在曹魏、蜀漢爭霸的舞臺漩渦之外，[12] 故習氏之作的重要性不應以量次計；尤以其在一片擁曹抑劉的潮流中，獨標仁義王道之師，力舉蜀漢大纛。對爾後南宋・朱熹（1130-1200）《通鑑綱目》以蜀漢爲正統的史觀遙舉其端，進而對說部《三國志演義》的敘述角度及諸多重要情節產生極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即擬就習氏如何透過對諸葛亮（181-234）神話的建構逐步架築其蜀漢正統論的歷史體系，進行描述與解析，並試圖就此標示習氏在三國史研究中的關鍵地位。

本文將重新審視習鑿齒史著的特性，修正傳統「三國學」將《演義》視作文學作品，而將陳壽《三國志》、《裴注》視爲歷史事實的簡單二元對立思維。基於《裴注》徵引諸書僅能隸屬史料之一的概念下，雖然能夠據此推測以逼近歷史眞相，但亦隱藏史家奠基不同立場之下的敘述偏見。[13] 是故本文擬將

載錄其臨終上疏，使其個傳篇幅成爲該卷之最，甚至超越了唐初史臣最稱賞的陳壽。史臣評價陳壽史才如下：「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2 月），頁 2159。按：本文所引《晉書》原典，除特別標示外皆據此本。

10 《晉書・王沈傳》：「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王）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眾論所非。」同前註，頁 1143。

11 魚豢《魏略》的相關研究，詳見拙著：〈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第 33 期（秋季號，2011 年 9 月），頁 1-34。

12 雖然《三國志・吳書》共二十卷，卷數多於《蜀書》十五卷，但是歷來史家大多將焦點集中在曹魏與蜀漢，較忽略孫吳於三國史的重要性。

13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史家必須將文獻中曾報導之各事件予以預鑄，俾能化爲一知識之可能對象。而預鑄行動即屬詩學，亦即未經審核與批判之前，即已存於史家自身意識所進行之編纂之中。」〔美〕海登・懷特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 12 月），上冊，頁 35。海登・懷特強調歷史著述定然滲入史家的自我意願，恢復歷史原貌本就無法實現；但是透過比較各家史觀的差異，後人應能逐漸拼貼出歷史的眞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晉春秋》、《襄陽記》二書置諸魏晉時期眾家史著的網絡之中，透過參照習鑿齒身處的時空背景，探究其對於襄陽人士與諸葛亮的美化過程。期使三國歷史圖像在重組與逼近歷史眞實的同時，定位出習氏著作在三國史[14]中最恰當的座標。進而剖析《漢晉春秋》、《襄陽記》等如何將「鄉里情結」[15]與蜀漢正統觀相互連結呼應的內在結構。尤有甚者，本文還嘗試對《漢晉春秋》的著述動機，提出能與傳統「裁抑桓溫說」相異而不衝突的論述。

二、三國正統觀的揭竿逆起

陳壽《三國志》甫一問世就爲時人所重，不僅讓號稱晉史重鎭的張華（232-300）託付撰寫《晉書》的重責大任，亦讓夏侯湛（243-291）情願毀壞己著的《魏書》；西晉官方更在陳壽過世後不久即派遣人員登門抄寫，顯示其對該書的認可。[16]面對該鉅著的存在，事隔半世紀之後，方有挑戰意味十足的史家出現，那就是持「晉承漢統論」而在正統觀議題上與之正面交鋒的習鑿齒。陳壽《三國志》將正統判予了曹魏政權，往後朱熹則反之將正統歸諸於蜀漢，[17]再經由《三國志演義》的鋪演與渲染，最終戲劇性地扭轉了中國傳統對

[14] 嚴格的「史學三國」之定義，則關注在「正統論」的焦點上，因而常從曹丕（187-226）公元 220 年代漢開始，直至公元 280 年三分歸晉爲止，詳見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頁 255-272。但是廣義的三國，事實上必須追溯至漢末宦官之亂與黃巾之亂的影響，詳見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6 月），頁 297。

[15] 李小樹：「『鄉里情結』，是指時人對其出生與生活的家鄉以及自己的家族、鄉鄰尤其是家族、鄉鄰中的名節之士表現出的的特殊的心理和情感。這裏的『家鄉』主要是指其所生所長之郡。」見氏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71。

[16] 詳見《晉書・陳壽傳》。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頁 2137-2138。

[17] 除朱熹之外，視劉備（161-223）係繼承漢統者而嘗試改寫三國史的著作，首見南宋中期的史家蕭常撰寫的《續後漢書》，之後更影響到元・郝經（1223-1275）《續後漢書》、張樞《續後漢書》、明・謝陛《季漢書》等等史家。詳見王德毅：〈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東吳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7 年 6 月），頁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國正統觀的看法。但在這一延綿千百年的爭執起落長河之中，習鑿齒其實才是一個重要關鍵轉折。

（一）西晉史家的正統觀

西晉王朝畢竟是接受曹魏禪讓而建國，因而在三國塵埃落定之後，諸多史家往往僅知曹魏而不知蜀漢。誠如清代錢大昕（1744-1813）所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久矣。」[18] 清代朱彝尊（1629-1709）更細數出「尊曹」的史家與史著：

> 于時作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陳）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19]

僅就窺視西晉官方三國正統觀的議題而論，朱氏指稱的諸書之中，完成於曹魏晚期的王沈《魏書》無疑最具代表性。與王沈共同撰作的史臣皆爲司馬氏黨翼，因而該書在說明西晉北人對三國正統觀的認定上，顯係相當具代表性。

該書係完成於曹魏正元年間（254-256），正是曹氏實權遭到臣下架空的重要轉折時代，[20] 即是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件」司馬懿（179-251）發動政變奪取曹爽（？-249）權力之後，而處於清除曹氏餘黨的「淮南三叛」（「王淩之叛」〔251〕、毌丘儉之叛〔255〕、諸葛誕之叛〔257-258〕）中後期之間。王沈《魏書》記載上往往扭曲事實以取悅當權者，因而唐初史臣

---

18 清・錢大昭著：《三國志辨疑》（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序頁 1。

19 清・朱彝尊著：《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 4 月），下冊，頁 696。

20 張蓓蓓在〈《傅子》探賾〉一文之中認爲當司馬氏與曹氏政治鬥爭之時：「士人必然面臨一種自清的壓力，尤以曾與曹黨相交相處之人更有迫切之感，傅玄亟亟表態，會不會有這樣的緣由存在？」見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134。該論應當亦頗貼切王沈撰述時的臨史心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晉書》視之爲「多爲時諱」，[21] 劉知幾亦抨擊其爲「假回邪以竊位」。[22] 王沈之書雖然在內部有明顯黨馬抑曹的傾向，但是就三國爭霸大舞臺的角逐立場而言，王沈仍然以曹氏、司馬氏爲依歸，時時不忘褒揚曹魏而貶抑蜀漢、孫吳，進而流露出強烈北方立場。例如對魏文帝曹丕之出生進行熱烈的造神運動：「（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23] 而且還追溯遠古以建構出曹魏家族譜系，欲訴說其先祖之正：

> 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24]

這些虛美的筆法，顯然是曹魏史官建構曹魏政權神聖歷史的具體作爲之一。對敵國則進行特意的貶抑敘述，例如對蜀漢丞相諸葛亮「將略」的詆毀，《三國志・蜀書・諸葛亮》注引《魏書》：「（諸葛）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25] 曹魏官方利用諸葛亮正好逝世的契機詆毀諸葛亮，表現出強烈黨同異己的企圖。裴松之稱之爲「蓋因（諸葛）亮自亡而自誇大也」，[26] 簡略的指明該條記載背後的著述心態。

往後陳壽撰寫《三國志・蜀書》時，則竭力於收集故國蜀漢的相關史料，

---

21 《晉書・王沈傳》。《晉書》，頁 1143。

22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頁 180。

23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魏書》。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 月），頁 57。按：本文所引《三國志》原典，除特別標示外皆據此本。

24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同前註，頁 1。

25 同前註，頁 926。

26 裴松之：「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同前註，頁 926-9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文之中還用「先主」來指稱劉備（161-223）、用「後主」來指稱劉禪（207-271），隱約之中似有表達其不忘故國之意。然而撰寫史著之時，陳壽畢竟已身爲晉臣，只能用列傳的方式行本紀之實的記載蜀漢與孫吳兩國領袖，而將本紀的位置給予曹魏政權。雖然陳壽在歷史記載上往往較顯得公正客觀，還能用三書并行的方式平等對待各國，相較於王沈無疑皆是很明確的進步，但依然不敢違逆西晉官方對三國正統觀的認定。

（二）東晉史家對西晉官方正統觀的承續

殊不論曹魏時期王沈《魏書》等西晉史家拘限於曹魏正統觀，即使時間推移至東晉時期的史家如王隱、孫盛、常璩（291-361）等，亦未嘗因中原淪陷、晉室遷移江左而認同與東晉處境相似的蜀漢政權。王隱涉及三國史的主要著作《蜀記》，目前無法確定該書是否在東晉時期撰寫，但並未違逆西晉官方的正統觀。該書主要收集與蜀漢相關的史料，還收錄稱美諸葛亮的「郭沖五事」、[27] 李興〈諸葛亮故宅銘〉[28] 等史料（皆見〈諸葛亮傳〉注引）；但是觀察其現今佚文，並沒有因而將正統歸諸蜀漢的傾向。書名亦採用蜀漢政權的地名「蜀」而非國號「漢」，應能窺見王隱心目中正統觀的端倪。[29]

孫盛《魏氏春秋》一書則顯然更將曹魏視作三國時期無可撼動的唯一政權。《史通・內篇・書事》斥責王沈、孫盛是「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衿夷狄而陋華夏」[30] 之徒。從劉知幾將孫盛與撰寫曹魏官方史書《魏書》的王沈並列，就不難想見該書確實擁有相當濃厚的北方意識。《三國志・吳書・吳範劉惇趙達傳》注引孫盛：

---

[27] 同前註，頁 917-918、921-922、922-923、926。

[28] 同前註，頁 936-937。

[29] 《蜀記》佚文最能察見其正統觀傾向的，當見《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注引《蜀記》：「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同前註，頁 1045。

[30]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頁 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趙）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睹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31]

這段評論雖有失於偏頗之嫌，裴松之亦在該論之後進行辯駁。[32] 然細案該論，不難察見孫盛所夾帶的意識型態，直指曹魏乃是合法的漢統承續者，係受天命於中原地區，對於臆測東南有王氣且「流竄」吳越的趙達嚴加譴責。

常璩《華陽國志》雖然裴松之徵引的數量並不多，但是該書不僅現今保存完整，且影響深遠。范曄（398-445）撰寫《後漢書》、崔鴻（470-520）撰寫《十六國春秋》、酈道元（466？-527）注《水經》、劉昭注《後漢志》，凡治西南地區歷史之學者無不時加徵引，重要性實不言可喻。[33] 常璩在撰寫該書時屢屢揄揚巴蜀，對故鄉寄予款款深情，任乃強即認爲：

> 永和三年，桓溫伐蜀，軍至成都，（常）璩與中書堅王監王嘏等勸勢降晉，隨勢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輕蜀人，璩時已老，常懷亢憤，遂不復仕進，裒削舊作，改寫成爲《華陽國志》。其主旨在於誇詡巴蜀文

31 《三國志》，頁 1426。

32 裴松之：「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閒，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同前註，頁 1426-1427。

33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7 月），「出版說明」，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化悠遠，記述其歷史人物，以頡頏中原，壓倒揚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誚藐。[34]

雖然如此，常璩在論及正統觀時依然還是抑蜀漢。《華陽國志・劉後主志》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35] 常璩身爲成漢（304-347）降臣，讚美諸葛亮之餘亦依然接受天命在魏晉的論述，[36] 指明蜀漢係「假已廢之命」，顯示其尚未試圖扭轉三國時期的正統。

（三）三國正統觀的初次扭轉

眞正起動扭轉三國正統觀的肇始者，其實是撰寫《漢晉春秋》、《襄陽記》的習鑿齒。[37] 習氏不但因此而睥睨前述諸位史家，甚至比起同期袁宏（328-376）《後漢紀》，[38] 更明確地公開進蜀漢而抑曹魏的宣言，從而有別於過往史家對魏、蜀、吳三國歷史定位的排列。[39]《晉書・習鑿齒傳》載其臨

---

[34] 同前註，「前言」，頁 2。

[35] 同前註，頁 429。

[36] 任乃強：「常璩舊撰《蜀漢書》，原有評亮語，與此不同。迨徙江左，改寫爲《華陽國志》，始換此論。責亮違天時，以適降臣口吻，然猶盛稱其治效，則初論爲頌揚無譏可知矣。」同前註，頁 430。

[37] 近來習鑿齒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在少數，可供參考者又例如〔日〕田中靖彥：〈〈漢晉春秋〉に見る三國正統觀の展開〉，《東方學》第 110 輯（2005 年 7 月），頁 49-64；方圓：《論習鑿齒之史學》（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柳春新先生指導，2009 年 8 月）。

[38] 袁宏在《後漢紀》末卷批判曹魏代漢：「漢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再用劉備稱帝做結尾，刻意不提及孫吳：「明年，劉備自立爲天子。」透過較間接的方式同情蜀漢。晉・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頁 863-864。白壽彝：「這似有以蜀繼漢統的意思，這也是跟陳壽不同的。」見氏著：〈陳壽與袁宏〉，《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頁 172。

[39] 後世追溯三國正統觀轉折時往往重習、輕袁，原因應與兩者表達方式有別相關，以及受到《晉書》載述兩位史家之個傳安排左右；譬如全文載錄習氏之正統論述、不論及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終上表：「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40]該表應能與習鑿齒針對己著《漢晉春秋》記載的陸抗（226-274）、羊祜（221-278）君子往來一事之議論併觀：[41]

> 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42]

習鑿齒認爲當時「三家不能相一」，曹魏、蜀漢、孫吳「力均而智侔」，「萬姓曠而無主」、三家「道不足以相傾」的情況之下沒有所謂正統存焉，要求西晉王朝承續東漢。所謂「晉承漢統」，其實亦能稱做是「越魏繼（東）漢」。從中隱約透露出習氏自身的道義批判，認爲蜀漢政權方是「仗正」之國，而表面國勢強盛的曹魏、孫吳政權均爲「犯順」的霸權之國。

習鑿齒此舉無疑開啓後來兩宋正統觀的爭端，清代章學誠（1738-1801）指出：

>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

《後漢紀》的內容，並且將袁宏列入〈文苑傳〉而多少影響到後人對東晉史學界的理解。這部份係參考陳俊偉：《兩晉史家的三國歷史圖像》（口試本）（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文進先生指導，2012 年），第四章第一節，頁 109-116。除此之外，筆者認爲《裴注》大量徵引習鑿齒史著，難免也使得歷代學者較不易重視到，徵引較少的同期史家袁宏之《後漢紀》於正統論述的貢獻。

[40] 《晉書》，頁 2157。

[41] 事見《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文長不引。《三國志》，頁 1357。

[42] 同前註，頁 1357-13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遜今之學苑也。[43]

章氏所論大體無乖，唯就本文前節所言，習鑿齒雖然尚未直接將蜀漢置諸正統的位置，但是距離正式將蜀漢視作三國正統僅剩一步之遙，實質上開啓後來朱熹等人的視野。據此就能看出習鑿齒持論在三國正統觀發展歷程中，凜然不可侵犯的春秋筆意。

習鑿齒給予蜀漢政權道義上的同情，除了表現在其臨終上疏外，還能從其早年撰寫的編年史《漢晉春秋》，斷然採用蜀漢年號一事判其心跡。[44] 倘若習氏前後思路是一致的，那麼採用蜀漢年號應該就是「天下無主」時的權宜做法，[45] 該舉應是要讚嘆蜀漢君臣上下心存復興漢室的志業。[46] 因而習氏撰寫的〈周魯通諸葛論〉一文，就對意欲扶漢的蜀漢政權與諸葛亮給予正面佳評；而對漢祚未盡就汲汲投奔孫氏政權的周瑜（161-223）、魯肅（172-217），責以小人之譴：

>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問：「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計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

---

[43]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柱：《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3 月），頁 278。

[44] 《三國志・蜀書・廖化傳》注引《漢晉春秋》：「景耀五年，姜維（202-264）率眾出狄道」，即使用後主劉禪年號「景耀」（258-263）。《三國志》，頁 1077。

[45] 莊瑄逸即持此說，見氏著：〈司馬光《資治通鑑》帝魏疏論〉，《中國文化月刊》第 258 期（2001 年 9 月），頁 111。

[46] 後人所以視習氏係直接將正統歸諸蜀漢，應是受《晉書・習鑿齒傳》記載的影響：「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但是這段記載未必是習氏夫子自道，要眞正理解習氏正統觀的內涵底蘊，應當使用其現存之作品，尤其代表其一生思想結晶的臨終上疏。《晉書》，頁 21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主人曰：「此乃眞所以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甯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跡當年，何由盡臣禮于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托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47]

周、魯二人功業彪炳，陳壽在《三國志・吳書》述之甚詳，[48] 但習氏竟然以小人重筆責之。規撫習氏之意，君子之道應當竭忠盡誠地扶持帝室，倘若事與願違則可退隱壟畝之間，豈能在漢室未亡之時就效忠異姓。諸葛亮能夠稱之爲君子，是因爲他在漢末群雄擾動之時有「匡漢之望」與「宗本之心」，效力的對象是漢室宗親劉備，企圖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貫徹漢室子民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因而異姓政權與該政權的君臣，置諸習氏價值體系之中，都只能是經不起道德檢驗的「犯順」之國與「小人」而已。

三、習鑿齒的諸葛亮想像[49]

（一）「三顧茅廬」的畫龍點睛

「三顧茅廬」的佳話其實早在魏晉時期就已經沸沸揚揚。根據目前所見的

47 宋・李昉編纂：《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第 4 冊，頁 706-707。

48 尤其是赤壁之戰（207）的功績，陳壽：「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荊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三國志》，頁 1281。

49 諸葛亮在生前身後皆有不少讚美與詆毀其形象的傳說故事，詳參陳翔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諸葛亮故事傳說〉，《三國志演義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最可信的應該就是諸葛亮自道的線索，《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其〈出師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50] 明確指出劉備曾經「三顧」諸葛亮草廬。陳壽亦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言道：「（劉備）遂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51] 諸葛亮本傳收錄的〈上《諸葛氏集》表〉同樣記載：「時左將軍劉備以（諸葛）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52] 因而西晉・張輔（？-305）亦指出劉備曾「屢造其（諸葛亮）廬」，[53] 往後常璩亦在《華陽國志》稱：「先主遂造（諸葛）亮，凡三往。」[54] 以上史籍確鑿，足證「三顧茅廬」本當確有其事。

但是此一歷史佳話的流傳，並非永遠浩浩湯湯、不起雜音波瀾。曹魏史家魚豢就處心積慮嘗試要破壞這段佳話。[55]《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魏略》：

> 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諸葛）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

月），頁 248-265；或可見〔日〕渡邊義浩：〈諸葛亮像の變遷〉，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 37 號（1998 年 3 月），頁 1-37。評審委員曾提醒，習鑿齒之記載很可能有鄉里傳說的部份，此說誠然。但是已經無法判別個別史料的承續狀況，相關研究在論述時往往是將著作權權且歸予習鑿齒。

50 《三國志》，頁 920。

51 同前註，頁 912。

52 同前註，頁 930。

53 西晉・張輔著：〈名士優劣論〉，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409。

54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補圖注》，頁 362。

55 魚豢除企圖摧毀「三顧茅廬」，尚有「誇飾魏延『子午道奇謀』以襯孔明拙於戰略」、「魏將驍勇善戰以對比孔明戰術失敗」、「藉孟達之依違反覆突顯孔明識人不明」，詳見拙著：〈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頁 15-28。有黨魏、黨蜀之史著，自然亦不乏黨吳的聲音，例如虞溥撰寫的地方志《江表傳》，當見魏晉時期三國史書寫的多重面貌。關於《江表傳》之特色，詳見拙著：〈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0 年 4 月），頁 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56]

魚豢之言雖然表面上仍稱許諸葛亮有行政長才，能洞見州郡官府疏失，但全文如項莊舞劍，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假意稱許諸葛亮，然筆鋒銳處實乃歸結於「亮乃北行見備」一語。其書寫策略意欲以中駟換上駟，將「三顧茅廬」的佳話抽樑換柱成諸葛亮乃是「登門求遇」的功利說客而劉備則是昧於天下大勢的庸才，因而根本沒有所謂「三顧茅廬」的光鮮亮麗。魚豢這段記載，裴松之早已糾舉其荒謬：

> 臣松之以爲（諸葛）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劉）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57]

裴松之認爲「良爲可怪」的情況，置諸三國時期史家往往黨同抑彼的著述實況之下，就成爲非常容易理解的事。即使劉備「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58]的明君形象，與諸葛亮兩人之間「希世一時，終始以分，誰能閒之」[59]的君臣之誼早已流芳後世，魚豢仍舊積極製造摧毀「三顧茅廬」神

56 《三國志》，頁 913。
57 同前註，頁 914。
58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習鑿齒。同前註，頁 878。
59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西晉袁準《袁子》。同前註，頁 9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話的言論，此一波折，應當從政治動機進行考量。畢竟「三顧茅廬」這一曠古罕見、如幻似夢，[60] 讓中國文人永恆追求的君臣神話，[61] 在當時顯然深具影響力，因而不難理解身爲敵國史家的魚豢，爲何會執意捏造出一個較符合人情的干謁過程。裴松之於《魏略》文末還附載西晉宗室司馬彪（243-306）史著《九州春秋》，[62] 該書繼承魚豢說法背後的意識型態實不言可喻。魚豢企圖摧毀「三顧茅廬」的佳話，而習鑿齒則挺身固守雷池，不但欣然接受此一故事，並且穿插諸多具體細節增加可信度與栩栩如生的眞實感，使得此一君臣佳話在歷史潮流中掀起令人驚嘆的漣漪波瀾。

諸葛亮的籍貫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63] 後來跟隨諸葛玄來到荊州就「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64] 得知諸葛亮並非當地出生，對習鑿齒來說諸葛亮的身分是「寓賢」。但是諸葛

---

60 於此之前只有商湯（？-1588 B.C.）五迎伊尹（1648-1549 B.C.）之個案，《史記・殷本紀》：「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94。

61 唐代李白（701-762）〈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3 月），頁 622。杜甫（712-770）〈蜀相〉：「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736。明代張居正（1525-1582）甚至以此爲「君臣魚水」之例，作爲對明神宗（1572-1620）逆政之鑒，明・張居正、呂調陽編，涂道坤譯：《帝鑑圖說——領導者必備的八十一種品格》（臺北：正展出版社，2002 年），頁 132-135。入清後更有畫工對此故事加以描摹，見清・沈振麟繪，清・潘祖蔭、歐陽保極、楊泗孫、許彭壽等書：〈君臣魚水圖（清內府朱絲欄圖繪寫本）〉，臺北故宮編輯：《捲起千堆雪——赤壁文物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9 年 5 月），頁 52。

62 《晉書・司馬彪傳》：「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晉書》，頁 2141。

63 《三國志》，頁 911。

64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亮躬耕隴畝之處以及「三顧茅廬」的地點何在，陳壽並未精確交待。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收錄諸葛亮自撰〈前出師表〉：

>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65]

諸葛亮自道躬耕之地與「三顧草廬」之地是在「南陽」，但是進一步地點始終沒有指明。王隱《蜀記》：「晉永興（304-306）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66] 雖然點出諸葛亮故宅爲「隆中」的地名，但仍尚未標誌「隆中」的確切所在。眞正將「隆中」與荊州襄陽聯繫在一起的，據目前能見史料考察係習鑿齒《漢晉春秋》所云：「（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67] 至此諸葛亮故居與荊州襄陽城的方位、距離總算得到明確的標示。

習鑿齒將諸葛亮故宅點明爲「隆中」的記載，很快就爲酈道元採用，《水經注》「沔水中」：

> 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爲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爲其宅銘焉。[68]

從王隱《蜀記》創造的地名「隆中」，經由習鑿齒將「隆中」定位在襄陽城西二十里，終於誘發了酈道元將「隆中」與「三顧茅廬」佳話聯繫在一起的具象

---

65 同前註，頁 920。

66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同前註，頁 937。專門探討王隱對諸葛亮之態度，可詳見陳俊偉：〈東晉王隱的諸葛亮歷史圖像〉，《有鳳初鳴年刊》第 8 期（2012 年 7 月），頁 411-432。

67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三國志》，頁 911。

68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8 月），頁 23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69]《昭明文選》李善（630-689）注諸葛亮〈出師表〉：「《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70] 亦是引用習鑿齒的記載。因而北宋・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鑑》就依照王隱、習鑿齒的說法：「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71] 可見諸葛亮居住「隆中」的說法逐步升級而爲後代史家正式承認。胡三省注也在「寓居襄陽隆中」下補充：

>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72]

引用的原始史料就是習鑿齒的說法。至此諸葛亮的故居「隆中」與「三顧茅廬」君臣相得的文化意象就此牢牢聯繫在一起；因此習鑿齒是中國文化史中，劉備訪賢佳話最關鍵的敘述者。[73]

---

[69] 酈道元注《水經》時豐富的徵引典籍，自然不會錯過陳壽、王隱、習鑿齒留存的相關史料。見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序〉，《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3 期（1986 年 9 月），頁 47-52。

[70] 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7 月，胡刻宋本），頁 517。

[71]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頁 2074。

[72] 同前註。

[73] 陳壽與習鑿齒的記載，似乎就成爲後來爭論諸葛亮躬耕處的焦點。一派根據陳壽的記載而堅持在「南陽」，從而推導出「南陽臥龍岡」；一派主要根據習鑿齒的說法在「襄陽隆中」。劉紅玉：「爭議的焦點就在於兩條史料：一是出自《三國志・諸葛亮傳》載〈出師表〉一文，諸葛亮在文中自稱『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一是出自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介紹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兩條史料的歧異，直接導致了諸葛亮的躬耕地是在南陽還是在襄陽長達一千多年的爭論。」見氏著：〈再論諸葛亮躬耕在南陽〉，《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37。該項爭議大陸學界已沸沸揚揚多年，本文不欲在此處停留，僅將習鑿齒「畫龍點睛」的意義與魚豢、司馬彪所言並置，突顯其記載對於「三顧茅廬」故事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習鑿齒的記載，當然有其對襄陽歷史、地理、人物的熟悉掌握做爲依據，《晉書・習鑿齒傳》記載習鑿齒與桓溫（312-373）之弟桓祕書信中曾言：

> 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璟璟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74]

這段話語裏面除同時交待「臥龍」（諸葛亮）、「鳳雛」（龐統，179-241）的稱號之外，[75] 還回顧過往襄陽地區所發生的三國往事，隱然表示著習鑿齒對於諸葛亮居住地的瞭若指掌。[76] 陳壽編纂的《諸葛氏集》中，諸葛亮爲劉備解說戰略的對策尚稱之爲「草廬對」；[77] 直至受到習鑿齒標舉「隆中」地理位置的影響，啓發了酈道元、李善諸賢，最後爲司馬光置入正史《資治通鑑》，後人終於將「草廬對」改稱赫赫有名的「隆中對」。[78] 後來毛評本《三國志演

74 《晉書》，頁 2153-2154。

75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有記載徐庶言諸葛亮係「臥龍」一事，但是將「臥龍」與「鳳雛」並稱則首見於習鑿齒筆下。《三國志》，頁 913。

76 習鑿齒還撰寫過〈諸葛武侯宅銘〉：「傾岩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鑾駕三招。」王瑞功指出這裏的「鑾駕」係指劉備，應而該句內容即是言劉備聘請諸葛亮。見王瑞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9 月），頁 719-720。

77 三國・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頁 1-2。該書係據清代張澍（1776-1847）編纂之《諸葛忠武侯文集》編排，說明張澍相當謹慎，尚且不敢改稱該對爲「隆中對」。

78 何茲全：「諸葛亮這段話，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歷史上有名的『隆中對』。」見氏著：《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頁 47。李傳印：「建安十二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第三十八回即爲「定三分隆中決策，戰長江孫氏報讎」，從中能夠看到從東晉習鑿齒、王隱，經過後代史家的確認後如何影響到歷史小說的軌跡。

（二）「七擒孟獲」的渲染

關於諸葛亮南征一事的始末，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有以下概括性的記載：

> 南中諸郡，並皆叛亂，（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建興）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79]

蜀漢國力在討伐孫吳失利後，已經元氣大傷。這時候蜀漢開國帝王劉備驟逝，繼位的太子後主劉禪並不諳政事，諸葛亮選擇先與孫吳恢復舊好而暫且擱下南方諸郡，往後才親自帶領軍隊平定之，從而順勢替蜀漢取得軍資。雖然陳壽對於「南征」一事的記載還散見在其他參與該次戰役者的本傳之中，例如《三國志・蜀書・李恢傳》：

> 丞相（諸葛）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李）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眾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80]

這段記載依序交待反叛者、蜀漢進攻路線、李恢扭轉蜀漢遭圍守的功績等等。陳壽對於李恢參與南征過程的記載，顯然比起主帥諸葛亮來得生動具體，但也

（207 年）即赤壁之戰的前一年，諸葛亮向劉備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策』。」見氏著：《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政治的關係》（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8 月），頁 167。

[79] 《三國志》，頁 918-919。

[80] 同前註，頁 10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尚未出現深受後代小說家熱衷的所謂「七擒孟獲」之蹤跡。

相較於陳壽對此事的簡略，習鑿齒則耗費不少篇幅渲染諸葛亮在南征時的風采。習鑿齒著述內的諸葛亮，除能在戰場間挫敗敵手，最膾炙人口的就是使用「攻心」的方式、「七縱七禽」以德服人，致使孟獲等當地土著從此不再反叛，爲後來北伐解決後顧之憂。《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 （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81]

這條史料即是後來《三國演義》「七擒孟獲」的史料原型，先是交待諸葛亮所戰皆捷，強調其領軍作戰的能力，並且在生擒敵方首領孟獲後還能夠信心十足的讓孟獲觀察軍中虛實。而且更令人激賞的是，即使軍中虛實盡讓孟獲所知，諸葛亮依然談笑用兵，屢次生擒對方，最終使得孟獲心服，說出「南人不復反矣」的由衷名言。該條史料還記載諸葛亮論述安頓南中上策的原委：

> 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諸葛）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82]

由此治理南中的策略，足見諸葛亮的心思縝密，顧及客觀形勢發展的睿智，這點亦與其善於治國的形象互相照應。

但是諸葛亮對南人「攻心」從而使得南中從此平定的奇蹟，實與歷史眞相不符。《三國志・蜀書・譙周傳》載譙周上疏：「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諸葛）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

[81] 同前註，頁 921。
[82]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83]《三國志・蜀書・李恢傳》則云：「南土平定，（李）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84] 事情的眞相應該是諸葛亮領兵，藉蜀軍兵勢征討南中，使南中「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之後當地人民還是「猶數反叛」。習鑿齒對於諸葛亮的景仰，導致其記載與史學實錄原則發生衝突。耐人尋味的是，往後裴松之徵引習鑿齒「七擒孟獲」一事時並未即刻給予批駁，司馬光《資治通鑑》亦照事收錄。如果連裴松之、司馬光都沒有發現問題，或者是爲保留佳話而情願忽視問題。無怪乎小說《三國志演義》能理直氣壯地將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從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興師，抗天兵蠻王初受執」洋洋灑灑揮毫撇演到第九十回「驅巨獸六破蠻兵，燒藤甲七擒孟獲」。

習鑿齒提出「七擒孟獲」一事除在正筆處美化諸葛亮外，其實在側筆處則悄悄的形塑另一位襄陽前賢。《三國志・蜀書・馬謖傳》注引《襄陽記》：

> 建興三年，（諸葛）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85]

根據此項資料，當見習鑿齒欲將「攻心」南中的「將略」與馬謖（190-228）交互連結的用心；並呈顯諸葛亮明智的納策，成就出「七擒七縱」的「心戰」故事。然而此事既已與歷史事實相差甚遠，亦不見諸其他記載，可見習鑿齒對歷史的建構中，其實暗蘊著「尊襄陽」的情結。馬謖指出南征是「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但實際上諸葛亮所使用的主要是「下策」，所謂「南方不敢復反」無疑是藉著誇飾諸葛亮而襯托馬謖的南征獻策。

[83] 同前註，頁 1030-1031。
[84] 同前註，頁 1046。
[85] 同前註，頁 983-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七擒七縱」的故事確定是虛構的，[86] 但習鑿齒對於諸葛亮的神化與崇敬則是毫無疑問。司馬光撰史頗採信習鑿齒，亦將南征一事收錄在《資治通鑑》，當然有助於該虛構歷史的傳播。[87] 實際上，習鑿齒並非首位記載「七擒七縱」的史家，常璩在《華陽國志・南中志》亦云：

> 夏五月，（諸葛）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擒、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88]

只是此處並未見到馬謖的身影，常璩紀錄孟獲言道「邊民長不爲惡矣」的話語，亦比起習鑿齒載「南人不復反矣」的語調還要保守一些，從這兩點能夠發現習鑿齒乃因傾灌其「襄陽情結」而過度渲染虛構了以德服人的神蹟。

相較於視諸葛亮如神祇聖賢的習鑿齒，另外一位與習氏同時期的史家孫盛，就對諸葛亮嚴加撻伐；例如記載諸葛亮對於南方安頓舉措的昏昧處理方式，使得裴松之不得不跳出來辯駁。該事見《三國志・蜀書・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89] 條下注引孫盛《魏氏春秋》：

> 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

[86] 余明俠：「縱擒孟獲的史實是可信的，但七擒七縱則是不可信的……首先，它是爲了誇大諸葛丞相的天威和用兵如神；其次，則是爲了證實馬謖『攻心爲上』的建議的正確性；再次，很可能是與漢代的喜歡以七命名的習俗有關。」見氏：《諸葛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6 月），頁 216。

[87]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2224-2225。

[88]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補圖注》，頁 241。雖然「七擒孟獲」一事常璩已經有所記載，然而就後世「諸葛亮神話」的接受概況而言，主要還是受到習鑿齒記載的影響居多。因爲習鑿齒的記載爲《裴注》收錄的關係，和陳壽《三國志》並置流傳，是以影響力當然遠超過《華陽國志》。

[89] 《三國志》，頁 8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90]

面對孫盛的記載，裴松之即難曰：「臣松之案：以爲（常）房爲（朱）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91] 裴松之從諸葛亮的執政風格來判斷，堅信不應造成如此不公不義的誤殺，判斷孫盛所言恐怕是虛妄之辭。同時透顯出孫盛等北方史家相對於南方史家書寫的史料、史籍，存有對立與歧視性質，當見東晉史家對諸葛亮形象認知的分歧。

（三）「六出祁山」的修補

習鑿齒描繪的諸葛亮與陳壽型塑的諸葛亮形象雖然在大方向上步伐一致，但仍略有差異，最具體的分野處主要在「將略」的部分得到強化。陳壽給予諸葛亮的評價爲：

>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92]

陳壽顯然對於諸葛亮的識治良才給予極高的讚美，交待孔明一連串穩定政權措施，與「讎必賞」、「親必罰」的執政實況，使得蜀漢「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能夠與管仲、蕭何等賢相相提並論。結束正面評價之後，陳壽還對於諸葛亮「連年動眾，未能成功」的事實提出解釋，認爲諸葛亮擅長「爲相」，但最刺眼的一句話卻在「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陳壽的諸葛亮評價雖然歷來飽受指責，如《晉書・陳壽傳》記載一條「或云」的史料：「（陳）壽父爲馬謖

90 同前註。

91 同前註。本文觀察孫盛相關著作的記載與評論，發覺孫盛對諸葛亮的態度似乎比較偏向負面；這些傾向性箇中顯係有文章存焉，尚待進一步伸論。

9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前註，頁 9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軍，（馬）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93] 認爲陳壽評價諸葛亮「將略非長」乃是挾私之言，這點清代王鳴盛（1722-1797）在《十七史商榷》早已論證該類史料內容之不實失眞，毋庸贅言。[94]

而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之中，卻能看到諸葛亮行軍作戰的傑出表現。雖然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95] 透過司馬懿表達對諸葛亮軍事才能的讚美，但諸葛亮在戰場上的具體概況卻往往只是簡略記載：

> 魏將王雙率騎追（諸葛）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96]

皆無較細密的作戰過程，讀者實較難從中目睹諸葛亮的風采。《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建興）九年，（諸葛）亮復出祈山，以木牛運」[97] 注引《漢晉春秋》，則記載諸葛亮兩次大破由司馬懿領軍的曹魏大軍，先是：

> （諸葛）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98]

先鋪述事件的開頭，爲後來主角諸葛亮與其宿敵司馬懿一決高下交待背景。且

---

93 《晉書》，頁 2137-2138。

94 詳見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214；今人辯誣的成果可參閱陶懋炳：〈陳壽曲筆說辨誣〉，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220-227。

95 《三國志》，頁 925。

96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同前註，頁 924-925。

97 同前註，925。

98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透過魏明帝之口，指出司馬懿是曹魏陣營唯一能擔此大任者，先鋪陳司馬懿的高度。當中雖可能有「尊晉」的情感在內，但就此史料而言「尊晉」只是爲了墊高「尊襄陽」之筆而已。接下則敘述實際的指揮概況與雙方首次交戰：

> 宣王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99]

戰果是由諸葛亮領軍的蜀漢獲勝，且破郭淮、費曜並「芟刈其麥」，最後是因爲司馬懿斂兵依險，軍不得交，雙方交戰才告一段落。然後是第二次交戰：

> 宣王尋（諸葛）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100]

除習鑿齒記載諸葛亮草廬地點與南征的史料，這裏關於北伐時期雙方的兩次交戰，《資治通鑑》亦載錄之，[101] 當見司馬光對於習氏史著之青睞。「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之言，幾乎掩蓋了諸葛亮北伐的無數挫敗。最後的結果是諸葛亮派遣魏延（？-234）等將領赴拒，並且戰勝曹魏大軍，獲得眾多軍用配備。如此結果合理的說明著司馬懿寧可固守不戰的緣故，同時交待著司馬懿畢竟是有識之士，方才不願與諸葛亮正面爭鋒。相較曹營其他無法體會諸葛亮軍

[99] 同前註。
[100] 同前註，頁 925-926。
[101]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2267-22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調度能力的主戰者，司馬懿受到負面型塑的程度最低，當是習鑿齒「尊襄陽」的同時還需兼顧「尊晉」的用心。清代牛運震（1706-1758）對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建興九年處的記載有過一段議論：「《漢晉春秋》此年，武侯出祈山屢勝魏軍，司馬爲之不出，傳悉畧而不載，殆以蜀勝而爲魏諱也。」[102] 這段論述只注意到陳壽有可能替「魏諱」，而沒有注意到習鑿齒本身其實具有強烈的諸葛亮崇拜傾向。

另外還有戰場上諸葛亮僅需聽聞部份消息，即能合理推敲出敵方主帥的用心，並猜透對方軍營內部將領對戰事的想法。《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 （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於其眾耳。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103]

從「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洞知司馬懿與辛毗之間實爲共同演一齣安撫內部的好戲。借魏明帝的君王權威與辛毗對君命的忠貞奉守，化解請戰者施與的壓力。畢竟司馬懿身爲統帥，對於底下各種異議的聲音，難免要略施手段。但是此舉依然無法逃出諸葛亮的法眼。習鑿齒的著述內，諸葛亮無論如何似乎總是勝過司馬懿一籌，且能「深得老賊之情」，[104] 洞悉司馬懿所思所爲；這條史料，其實正透顯著習鑿齒對諸葛亮的傾服，司馬光亦再度將習氏著作的史料載於《資治通鑑》。[105]《三國志・蜀書・諸葛亮》：

---

[102] 清・牛運震撰：《空山堂讀史糾謬》（嘉慶二十三年刻空山堂全集本），清・杭世駿、牛運震等撰：《二十二史考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2 月），第 1 冊，頁 344。

[103]《三國志》，頁 926。

[104] 余嘉錫評語，見《世說新語・方正篇》第 5 條評。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1 月），頁 284。

[10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22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十二年春，（諸葛）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106]

裴松之該條下徵引兩條史料，第一條史料就是前引《漢晉春秋》記載諸葛亮洞悉辛毗持節實爲自導自演一事。第二條則是司馬懿洞悉蜀漢軍情之事，孫盛《魏氏春秋》：「（諸葛）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107] 表面上呈顯諸葛亮事必躬親的形象，但細究其背後所透露的意涵，實爲突顯司馬懿洞達諸葛亮如此治軍理政的弊端。蜀國使者如此輕言軍機，更見蜀國使者本欲炫耀反而洩漏秘密的愚蠢。這條記載與《漢晉春秋》的敘述重心迥然不同，表現出習鑿齒、孫盛建構三國史時不同的側重與取角。

類似孫盛建構出諸葛亮北伐不斷處於劣勢處境的論述，除前引王沈《魏書》之外，魚豢在《魏略》一書中也對孔明指揮作戰能力頻加詆毀，最醒目的則爲捏造出諸葛亮不願採用魏延「子午道奇襲」的失策。見《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

> 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108]

魚豢所謂魏延的計謀係最受歷代史家青睞的「子午奇謀」。明代張溥

106 《三國志》，頁 925。
107 同前註，頁 926。
108 同前註，頁 1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02-1641）曰：「子午之策，彷彿孫、吳，（諸葛）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審矣。」[109] 清代尚鎔：「然觀漢中之討策出法正，子午之計不從魏延，謂之（諸葛亮）應變將畧非所長，亦未可厚非也。」[110] 甚至因此而導致孔明持軍過於謹愼的解讀，進而喪失先機的憾事，林超、孫承烈合著的〈蜀道考〉即稱：「諸葛亮一生謹愼，其所以舍近而就遠者，蓋蜀道正當曹魏兵力之衝，故寧遠趨甘肅，採取迂迴戰略，而不聽魏延出子午谷之計也。」[111] 其實《魏略》該條記載並不盡然爲實情，陳壽記載該事如下：「（魏）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112]「韓信故事」其實就是司馬遷（145-86 B.C.）在《史記・高祖本紀》所言的「韓信之計」：「（漢高祖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113] 這條計策亦即是後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諺語之由來，《史記・淮陰侯列傳》「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114] 之事。但是從各家的解釋觀看，其實都沒有證據能夠說明韓信使用的險道就是魚豢記載的子午谷，兩者不應混爲一談，裴駰在《集解》僅言：「《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115] 張守節《正義》亦僅言：「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116] 無法證明魏延之策必是「子午道奇謀」。魚豢應是企圖透過這條記載，讓諸葛亮在魏延傑出的「將略」下相形見

[109]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 2501。
[110] 清・尚鎔著：《三國志辨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嘉慶刻本），第 6 輯，第 5 冊，頁 317。
[111] 姚季農主編：《三國史論集・第二集》（臺北：古籍史料出版社，1973 年 1 月），頁 267。
[112]《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三國志》，頁 1003。
[113] 見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頁 368。
[114] 同前註，頁 2613。
[115]《史記・高祖本紀》。同前註，頁 368。
[116]《史記・淮陰侯列傳》。同前註，頁 26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絀，[117] 從而表現出孔明過於謹慎致使軍隊裹足不前的缺陷。這些缺陷約百年後在習鑿齒的筆端得到彌補。

習鑿齒的三國史圖像內，常見尊敬司馬氏的情況，但是一與諸葛亮爭鋒則屢屢落居下風。這點可以先比較《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引兩條史料的差異之處，以明曉習鑿齒對於司馬氏的尊崇。先是郭頒《世語》：「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118] 著述重點顯係在鍾會（255-264）身上，但是《漢晉春秋》卻略有所別：

> 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119]

雖然重點依然在鍾會身上，但是涉及司馬氏的筆墨顯係增加。裴松之就明確地指出：「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120] 與《世語》相較，習鑿齒更加重尊崇司馬氏的語氣，所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實說明著司馬氏乃是「非常之人」。但是這「尊晉」的情感於習鑿齒的框架之中，卻始終略遜於襄陽「寓賢」諸葛亮一籌。《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 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121]

---

[117] 呂思勉：「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計，實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將略，亦就因此可見了。」見氏著：《呂著三國史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 月），頁 118。

[118] 《三國志》，頁 791。

[119] 同前註。

[120] 同前註。

[121] 同前註，頁 9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世「死諸葛走生仲達」諺語的典故即源自《漢晉春秋》，即使是實際開創晉朝的司馬懿，面對諸葛亮時始終相形見拙，《資治通鑑》亦採納之。[122] 這條史料表現出司馬懿處處畏懼諸葛亮的惶惑，間接說明諸葛亮領軍作戰的能力已給予北方重大威脅。[123] 在北伐始終沒有成功這一無法撼動歷史事實框架之下，習氏則在細節中，嘗試補充進對諸葛亮有利的史料，從而進行了修飾諸葛亮「應變將略」的瑕疵。

四、習鑿齒襄陽情結與正統觀的糾纏

（一）鄉里情結與「臥龍」、「鳳雛」對舉並稱的神格化

魏晉時期不同地域士人間的爭勝抑揚素來蔚爲風氣。僅就與習鑿齒相關記載則有：「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124] 這種論爭的背後動因，應蘊蓄故鄉的情結。作用於歷史著作之時，除導致史家對於故鄉史料的詳加收集，[125] 亦難免會在敘述之時過度美化褒揚家鄉風土人物，《襄陽記》的內容亦如是：

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

[12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2296。

[123] 陳翔華已經注意到諸葛亮形象從六朝至唐代，有從「名士」變成「名將」甚至「智將」的演變。但是陳氏並沒有將習鑿齒置諸於《裴注》的體系之中，未能更確實地交待出習鑿齒在眾多三國故事中的定位與座標。見氏著：〈唐代的故事傳說與詩歌藝術形象〉，《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頁 70-71。

[124] 《世說新語・排調篇》第 41 條。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809。

[125] 習鑿齒之著作與襄陽地方史的相關探討，可詳見黃惠賢著作的一系列文章，見氏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 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坡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126]

盧弼針對這條史料：「此蓋《襄陽記》欲彰董恢之美，遂不覺其辭之誣。設（費）禕不能專對，何以諸葛亮妙簡使才，而禕頻煩至吳乎？」[127] 盧氏的辯駁的確是一語中的，《三國志・蜀書・費禕傳》就有不同的記載：

> 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費）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128]

費禕（？-253）不辱君命的風采，讓人不禁懷疑習鑿齒載費禕「愕然四顧視」之狀，純係爲襯飾襄陽董恢的妙才之舉。裴松之同樣提出質疑：

> 《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129]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對同件事情的記載不同，已經讓人相當困惑，這很可能說明了《襄陽記》褒揚襄陽人物的傾向更形嚴重。董恢當時若已經「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則與陳壽《三國志》載董恢「年少官微」恐有所出入。裴松之僅認爲習鑿齒該言「不審」，但是透過盧弼的論證，應該足以推測《襄陽記》記載的史料應是經過刻意修飾與改動，或者根本有相當濃

126 《三國志・蜀書・董恢傳》注引。《三國志》，頁 986-987。
127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 2609。
128 《三國志》，頁 1060-1061。
129 《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注引。同前註，頁 9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厚的虛構成份。

習鑿齒對於襄陽前賢的推崇，最具代表性的傑作，應以「臥龍」諸葛亮與「鳳雛」龐統並稱對舉的神格創說。《襄陽記》：

>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130]

此處是「臥龍」、「鳳雛」並稱的第一手資料，亦是三國到魏晉南朝間的眾多史籍之中，唯一記載兩人並稱的史書。

「臥龍」、「鳳雛」固然在三國說部系統中兩兩輝照，實際上此項史料的可信度居然也受到後來史家的追認。如前段史料與《襄陽記》的另一條記載：「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131]這兩條史料皆被《資治通鑑》收錄：

>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132]

---

130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注引。同前註，頁 953-954。
131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同前註，頁 913。
13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2075-20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133]

「臥龍」、「鳳雛」並稱從地方史的層次，在歷經六百年以上的流傳之後，居然被採錄正史。伴隨著《資治通鑑》廣泛的影響力，增加其歷史事實的可信度，爾後又被寫入說部系統，但也因此形成《三國志演義》在大結構上的重大難題。[134]

（二）襄陽情結的親疏有別

「鳳雛」龐統的本傳，見《三國志・蜀書・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135] 當見龐統乃是襄陽當地人物，相較於從外地遷移而來的「寓賢」諸葛亮，更能代表著習鑿齒的「鄉里情結」。習鑿齒就藉劉備、龐統的一次君臣往來，襯示出龐統的人格與識見。《三國志・蜀書・龐統傳》：

> （劉備）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136]

劉備酒宴之時未免有些得意忘形，甚至怒逐出直諫的龐統。幸而最後其尋而悔悟，而龐統返復宴會之後亦妙語相對的化解尷尬，君臣之間方能「宴樂如

---

[133] 同前註，頁 2074。

[134] 一旦兩人對舉，史料傳聞遠不及諸葛亮豐富的龐統，其表現就必須要達到足以與諸葛亮並稱的高度，這對小說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難題。詳見林盈翔：〈習鑿齒《襄陽記》與臥龍、鳳雛並稱的源起——兼論《三國志演義》中龐統角色的成敗〉，《雲漢學刊》第 18 期（2009 年 6 月），頁 25-54。

[135] 《三國志》，頁 953。

[136] 同前註，頁 955-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而不損害雙方的情誼。對於這次事件，習鑿齒即言：

> 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137]

裴松之則對於習鑿齒這一長段的議論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頗值得本文借鑒：

> 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龐）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劉）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138]

習鑿齒所言所論基本上「大旨無乖」，但是其「推演之辭」未免有些「流宕」之處；這部份很可能就是習鑿齒宥於地方情結，過於推揚龐統直諫，連帶使劉備受到「負信違情，德義俱愆」等批評的緣故。

任何人物只要與襄陽土著產生衝突，習鑿齒往往就站在襄陽士人的立場進行議論，明顯表現出親疏有別、層次分明的毀譽。不僅習鑿齒視作「漢高之正胄」、「信義著於當年」的劉備無法倖免於難，即使其偶像諸葛亮亦不可批其逆鱗。《三國志・蜀書・馬良傳》注引《襄陽記》有段馬謖在違反諸葛亮軍令而丟失街亭後，下獄伏法時前後的記載：

> （馬）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

[137] 同前註，頁 956。
[138] 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時十萬之眾爲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139]

若先剔除《襄陽記》、《漢晉春秋》的記載，馬謖一生實令人有乏善可陳之嘆；陳壽〈馬謖傳〉載劉備：「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140]這一判斷是非常正確的。然而《裴注》注引之習鑿齒看待這次事件，竟然一反常態地流露出對諸葛亮的不滿：

>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141]

追根究底，關於馬謖的種種優秀表現與記載，都僅見於習鑿齒自己的著作之中。造成諸葛亮在「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的情形下，還「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的假象，再用以抨擊諸葛亮執法過嚴產生的弊病。

畢竟與襄陽土著馬謖相比，「寓賢」難免就是「外人」，因而不難理解習鑿齒何以使用看似「大義凜然」的評論來批評諸葛亮了。盧弼在《三國志集解》引何焯（1661-1722）：

> 魏延、吳壹等輩，皆蜀之宿將，（諸葛）亮不用爲先鋒，而違眾用

[139] 同前註，頁 984。
[140] 同前註，頁 983。
[141] 同前註，頁 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謖，其心已不樂矣。今謖敗而不誅，則此輩必益曉曉，而後來者將有以藉口，豈不惜一人而亂大事乎？凡亮之治國，所以能令人無異議者，徒以其守法嚴而用情公也。習氏之論，亦不達於當時之勢矣。[142]

對於諸葛亮何以要殺馬謖，剖析得相當精當，並指出習氏議論是「不達於當時之勢」。馬謖在當時蜀漢軍隊之中並非重要人物，扣除習氏自載的南征一事之後，亦未有傑出的實績表現。殺之，未必眞有損於蜀國；不殺之，則諸葛亮無以面對蜀漢軍民。倘若不誅殺馬謖，則諸葛亮將蒙受偏黨「荊楚人物」之譏。這不僅將造成諸葛亮在治國方面會備受爭議，從而很可能無法再徵信於國內的其他勢力，造成蜀漢政權穩定的危機。[143]

前文提起諸葛亮與司馬懿之爭，晉臣習鑿齒面對自身效力王朝的實際開國之君司馬懿，態度明顯就不及襄陽「寓賢」諸葛亮。本節提起諸葛亮與馬謖的衝突，則習氏面對「寓賢」的態度亦不及土著，這些都與習氏「襄陽情結」的深層結構息息相關。

（三）「裁抑桓溫說」商榷

《晉書・習鑿齒傳》：「習鑿齒字威彥，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144] 習鑿齒爲襄陽地區豪族，其著作《襄陽記》[145] 一書正屬於劉知幾認

[142]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 2604。

[143] 諸葛亮執政蜀漢時，內部尚有諸葛亮爲首的「新人」一派，與李嚴爲首的「舊人」一派，兩者間實保持著緊張的平衡關係。詳見田餘慶：〈李嚴興廢與諸葛用人〉、〈蜀史四題——蜀國新舊糾葛的歷史追溯〉，《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頁 190-207、213-243。

[144] 《晉書》，頁 2152。

[145] 《襄陽記》應是《襄陽耆舊記（傳）》之簡稱，盧弼引章宗源：「愚按：《續漢・郡國志》注：蔡陽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陽耆舊傳》。《文選・兩都賦》引之，則稱《耆舊記》。劉昭生處梁代，其所引在〈隋志〉前，則知稱傳之名，其來已久。《三國志》注多省文，稱《襄陽記》。」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頁 24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的「務欲矜其州里」[146]的「郡國之書」，[147]記載與襄陽相關的諸多史料，包括當地的前賢名士，內容亦明顯有「矜」、「誇」的美化與修飾情形。《襄陽記》身爲地方史而特別推讚襄陽人物本屬當然。唯獨該書同時採用《漢晉春秋》「晉承漢統」的架構，[148]這點頗值得注意。檢視《漢晉春秋》的歷史圖像，不難發現習鑿齒對於襄陽人的熱愛除在地方史有所表現，於編年體正史亦然，這點在第三章論述習鑿齒的諸葛亮想像時非常容易察見。出自同一史家的兩本著作，在著述的意識型態顯然有諸多相互連結共構之處，這同時是本文將兩書並置探討的緣由之一。

倘若配合另一項數據併觀，狀況將更耐人尋味，那就是《裴注》對《襄陽記》的載錄情形：在《蜀志》共 15 條，《吳志》僅 4 條，《魏志》則無任何蹤影，正說明三國時期多數襄陽前賢乃是效力於蜀漢政權。選擇褒揚蜀漢政權，無疑與誇耀襄陽前賢遙相呼應，更何況當中還包括魏晉時期就已經「聲烈震於遐邇」[149]且與襄陽當地土著交往熱絡的諸葛亮。倘若維持將曹魏視作正統王朝的三國史論述，諸葛亮諸賢復興漢朝時正義凜然的道義色彩難免相形失色，這時候進蜀漢、退曹魏與習鑿齒對於鄉國家邦的情結兩兩吻合。從「鄉里情結」的立基點檢視，則習鑿齒撰寫《漢晉春秋》、〈晉承漢統論〉褒蜀漢、貶曹魏理念發想的背後，除傳統「裁抑桓溫」說之外，似乎還有一層「矜其州里」的連結性糾結著。

歷來視習鑿齒撰寫《漢晉春秋》係謂「裁抑桓溫」的說法，其實頗待商榷。這項說法的出處，最主要是來自唐初史臣《晉書》，《晉書・習鑿齒傳》：

---

146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頁 108。

147 同前註。

148 清代任兆麟：「考原書：前載人物，中載山川、城邑，後載牧守。隋志稱記，唐志始稱傳。今本不載山川、城邑，則云傳亦可。然前人所引率稱記，則仍舊名爲得也。中列時代：以晉繼漢，以漢繼周，居然春秋筆法。」清・任兆麟：〈心齋十種本序〉，見東晉・習鑿齒撰，黃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附錄卷一，頁 87。

149 西晉・張輔著：〈名士優劣論〉，頁 4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時桓溫覬覦非望，（習）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150] 但是《世說新語・文學第四》第 80 條的記載卻與之牴觸：

> （習鑿齒）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越。[151]

習鑿齒撰寫《漢晉春秋》之前固然與桓溫曾經發生衝突，但是這件事情未必完全就是其著述動機。唐初史臣採用的原始資料，應該就是該條下蕭梁・劉孝標（462-521）引用之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習）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桓）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户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152] 若就《世說新語》與《續晉陽秋》的差異，應能指出「裁抑桓溫說」尚未能視作篤論。

劉知幾或許是最早察見箇中問題的史家：

> 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罔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物議，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153]

意識到藉由「勒成一史」來「取誡當時」，恐怕是件「博而非要」的有違人情之舉。倘若僅是要透過史籍來「裁抑桓溫」，東晉史家孫盛的做法方才是最立竿見影、劍及履及，而不必像習鑿齒如是大費周章。《晉書・孫盛傳》：「（孫盛）《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

[150] 《晉書》，頁 2154。
[151]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頁 258。
[152] 同前註。
[153]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頁 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154] 孫盛就在其著作《晉陽秋》之中特別記載桓溫枋頭之戰（369）失利一事，讓桓溫盛怒，顯示其有效擊中桓溫要害。同是透過史籍對抗桓溫，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就採納這條孫盛著墨書寫枋頭之敗的史料，[155] 卻唯獨對檀道鸞或《晉書》的此項資料付之闕如。揆諸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時既然屢屢引用《漢晉春秋》，對於習鑿齒與該書的相關問題必然有系統性的見解，或許正是意識到《續晉陽秋》與《晉書》的說法頗值得質疑，故不宜採用。

誠然未必要切斷桓溫與習鑿齒史著的關係，史家敏感的心靈本就容易受到時代的影響，[156] 完全否定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極端。[157] 較可靠的解決之道，若能由揭示出「矜其州里」的動機，相信新舊說配合下，更能挖掘出習鑿齒撰寫該書背後複雜的動機。劉知幾、司馬光兩位權威史家的態度更啓示本文，習鑿齒撰寫《漢晉春秋》的主要動機恐怕不是爲了「裁抑桓溫」，而是如同常璩撰寫《華陽國志》般意欲「矜其州里」，甚至更進一步志在建構出一本屬於襄陽人的三國史書。

五、結　語

在一片擁曹抑劉的潮流中，習鑿齒獨標仁義王道之師，力舉蜀漢大纛。對爾後南宋・朱熹《通鑑綱目》以蜀漢爲正統的史觀遙啓其端，進而對說部《三

154 《晉書》，頁 2148。

155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頁 3227。

156 誠如張蓓蓓：「桓溫自穆帝永和十年（三五四）後大權在握幾二十年，覬覦神器幾已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希望這些史家全無反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見氏：〈袁宏新論〉，《魏晉學術人物新研》，頁 185-187。

157 劉靜夫：「從檀道鸞等認爲習氏著史的目的只是爲了斥桓溫野心這一點來說，劉氏的批評是正確的。但他由此走向另一極端，否認習氏有斥桓溫之意，又是不對的。習氏因爲在中央皇權同方鎮權臣的矛盾中傾向于皇權方面，便被桓溫排斥，他想以某種方式裁抑桓溫也是自然的。」見氏著：〈習鑿齒評傳〉，《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5 月），頁 3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志演義》的敘述角度及諸多重要情節產生極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認爲，習氏在架構其蜀漢正統論的體系時，最主要的策略係通過對諸葛亮神話的建構：（一）透過「三顧茅廬」地點的具體化巧妙地固守蜀漢「明君賢相」之間的君臣佳話，並間接強化以復興漢室爲目標的「隆中對」之神聖性。（二）透過「七擒孟獲」的渲染塑造諸葛亮率領的軍隊乃是仁義之師的象徵，證明蜀漢乃是一以德服人、符合人民期望的王師，而非僅是一味憑藉武力攻伐征殺的霸權。（三）陳壽雖然給予諸葛亮「識治」長才的高度評價，但卻無法迴避其「將略」爲短的瑕疵；習鑿齒則除以「七擒孟獲」美化南征之役外，還透過蜀漢大軍北伐時屢勝曹魏大軍，以及穿插司馬懿對於諸葛亮的惶惑之態，間接抬升諸葛亮在戰場指揮上的神態自若，藉此修補陳壽評論所帶來的負面傷害。而且習鑿齒的著作，在司馬光史學鉅著《資治通鑑》中屢被採納，無疑不斷提高其可信度，進而在說部《三國志演義》中也不斷出現習氏史著的身影。伴隨這兩部著作的傳播，許多源自習氏史著的內容，像是三國故事中最傳神的「三顧茅廬」得到了確認，而「臥龍」「鳳雛」並稱、「七擒孟獲」、「死諸葛走生仲達」也如虎添翼般的喧騰成廣爲人知的三國傳奇。習氏擁有非常濃厚的「鄉里情結」，身爲晉臣的身份使其難免必須推崇司馬氏，但只要遇到司馬懿與襄陽「寓賢」諸葛亮交手時，其立場明顯傾向諸葛亮；尤其耐人尋味的是，當襄陽「寓賢」、亦即習氏深深愛載的諸葛亮一但與襄陽土著馬謖若有衝突時，習氏的情感也微妙向馬謖傾斜。顯見「襄陽情結」實爲一等差結構。根據以上所論，本文大致能夠推斷：習鑿齒志在建構專屬於襄陽士人的三國史；而其三國史中蜀漢的正統觀與其「矜」、「誇」鄉里的情結，乃一纏繞相結、互爲表裏的結構。

（責任校對：傅凱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三國・諸葛亮著，段熙仲，聞旭初編校：《諸葛亮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5 月。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 月。

晉・常璩著，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7 月。

晉・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2 月。

＊東晉・習鑿齒撰，黃惠賢校補：《校補襄陽耆舊記》，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

北魏・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8 月。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7 月，胡刻宋本。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3 月。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2 月。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6 月。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宋・李昉編纂：《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3 月。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6 月。

明・張居正、呂調陽編，涂道坤譯：《帝鑑圖說——領導者必備的八十一種品格》，臺北：正展出版社，2002 年。

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等校點：《十七史商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1 月。

清・朱彝尊著：《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 4 月。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 月。

清・尚鎔著：《三國志辨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1 月，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嘉慶刻本。

清・杭世駿、牛運震等撰：《二十二史考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 2 月。

清・錢大昭著：《三國志辨疑》，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3 月。

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2003 年 11 月。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6 月。

二、近人論著

＊王文進：〈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0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月），頁 83-124。
＊王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第 33 期（秋季號，2011 年 9 月），頁 1-34。
王瑞功主編：《諸葛亮研究集成》，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9 月。
王德毅：〈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東吳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7 年 6 月），頁 1-23。
方　圓：《論習鑿齒之史學》，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柳春新先生指導，2009 年 8 月。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月。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
＊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 3 月。
余明俠：《諸葛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6 月。
呂思勉：《呂著三國史話》，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9 月。
李小樹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9 月。
李傳印：《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政治的關係》，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8 月。
何茲全：《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 3 月。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6 月。
林盈翔：〈習鑿齒《襄陽記》與臥龍、鳳雛並稱的源起——兼論《三國志演義》中龐統角色的成敗〉，《雲漢學刊》第 18 期（2009 年 6 月），頁 25-54。
林盈翔：《裴松之與劉孝標史注學比較研究》，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文進先生指導，2010 年。
吳直雄：〈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版）》第 40 卷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74-80。

姚季農主編：《三國史論集・第二集》，臺北：古籍史料出版社，1973 年 1 月。

莊瑜逸：〈司馬光《資治通鑑》帝魏疏論〉，《中國文化月刊》第 258 期（2001 年 9 月），頁 106-126。

＊張蓓蓓：《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張　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年 1 月。

黃惠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 月。

陳俊偉：〈東晉王隱的諸葛亮歷史圖像〉，《有鳳初鳴年刊》第 8 期（2012 年 7 月），頁 411-432。

陳俊偉：《兩晉史家的三國歷史圖像（口試本）》，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王文進先生指導，2012 年。

＊陳翔華：《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陳翔華：《三國志演義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9 月。

陳健梅：〈裴松之生卒年考〉，《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1 年 5 月），頁 52。

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序〉，《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3 期（1986 年 9 月），頁 47-52。

葉　植：〈論題係沙上建塔，鐵證乃謬誤堆成——答吳直雄先生並與其《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再考辨》一文商榷〉，《襄樊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12 期（2011 年 12 月），頁 13-23。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

臺北故宮編輯：《捲起千堆雪——赤壁文物特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9 年 5 月。

劉紅玉：〈再論諸葛亮躬耕在南陽〉，《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 31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37-38。

劉靜夫：〈習鑿齒評傳〉，《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5 月，頁 322-338。

羅秉英：《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

〔日〕田中靖彥：〈〈漢晉春秋〉に見る三國正統觀の展開〉，《東方學》第 110 輯（2005 年 7 月），頁 49-64。

〔日〕渡邊義浩：〈諸葛亮像の變遷〉，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 37 號（1998 年 3 月），頁 1-37。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 12 月。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X.-H. (1990). *Zhu ge liang xing xiang sh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Zhuge Liang's image).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Duan, X.-Zh., & Wen, X.-Ch. (Eds.). (2010). *Zhu ge liang ji* (Collected works of Zhuge Liang). Beijing: Zhonghua.

Huang, H.-X. (1987). *Jiao bu xiang yang qi jiu ji* (*Sages in Xiangyang* by Xi Zao-Chi: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edition). Henan: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Li, Ch.-J. (2002). *San guo zh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gdu: Ba-Shu.

Lu, B. (2009). *San guo zhi ji jie* (A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Ed. Qian, J.-F.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ei, S.-Zh. (2007). *San guo zhi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 annotat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W.-J. (2010).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images of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A quartet of national, historical, mental and narrative mat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8), 83-124.

Wang, W.-J. (2011). How do Yu Huan construction's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image in his book *Weilüe. Studies in Sinology*, (33), 1-34.

Yu, Zh.-T. (2008). *Pei song zhi san guo zhi zhu yan jiu* (A study on Pei Song-Zhi's commentary on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 Huamulan.

Zhang, B.-B. (2001). *Wei jin xue shu ren wu xin yan* (A new study on the scholars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aipei: Da-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